

从《致孩子们书》中看 梁启超带病工作的最后三年

○汤仁泽

梁启超病逝前的数年间，带病超体力、超负荷地劳作，特别是一次误诊，大大缩短了他的生命。从肾脏手术至病故，只有三年多时间，梁启超却以惊人的毅力，创造出卓越的成就。

摧残梁启超身心最直接、最严重的，当属北京协和医院对肾病的误诊。

1926年初，困扰已久的便血越发严重起来。2月9日《致孩子们书》说：“我的病还是那样，前两礼拜已见好了，王姨去天津，我便没有去看。又很费心造了一张《先秦学术年表》，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。”很多人都劝他去医院诊疗，他不以为然，还调侃说：“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都没有，精神体气一切如常，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，便什么事都没有，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。”在动手术之前，梁启超始终没把疾病当回事。

1926年1、2月因便血加剧，先入北京德国医院诊疗，2月18日写信告诉孩子们：“我这回的病总是太大意了，若是早点医治，总不至如此麻烦。”3月，转入协和医院，诊断为“右肾生瘤”，遂于16日割去右肾。“然割后血仍不止。”到了8月，病情仍没有想象中的好转起来：“病



梁启超像

虽未痊愈偶然便带哑色，但已非红非紫”，还安慰孩子说：“比前次确减轻许多，余年之痼疾，本非三数日所能全治，但药之有效，已灼然矣。”

伍连德医学博士很快就知道割去右肾是误诊引起的：“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，割掉了右肾，他已看过，并没有丝毫病态，他很责备协和粗忽，以人命为儿戏，协和已自承认了。这病根本是内科，不是外科。”伍连德对梁启超“下很严重的警告”，他说：“割掉一个肾，情节很是重大，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，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，才算复原。当左肾极吃力，极辛苦，极娇嫩，易出毛病，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。”他还下了戒令：“节劳一切工作，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。”这次意外的误诊

和医疗事故,给身体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,但无论病情多严重,忠告多严厉,真正的工作狂若无其事。自己说:“大抵我这个人太闲也是不行,现在每日有相当的工作,我越发精神焕发了。”在他给子女的信中,每每隐瞒身体每况愈下的现实,总以报喜不报忧的言辞来安慰儿女们。

身体稍有好转,便欣喜若狂,致二弟梁启勋信中说:“返津服药状况大佳,赤焰净尽,其清若镜,味甘如饴矣。”接着就是无休无止地工作。

繁忙沉重的工作,压得梁启超喘不过气来。1926年10月19日《致孩子们书》说:“我这几天忙得要命,两个机关还有两位外宾,一位日本清浦子爵(前首相,旧熟人),一位瑞典皇太子(考古学者)。天天演说宴会,再加上学校功课,真是不了。”繁忙中常常忘却自己有病在身,“天天被王姨唠叨,逼着去睡。现在她又快来捣乱了,只得可不写了。”

同年12月10日《致梁思永书》说:“我近来真忙,本礼拜天天有讲演(城里的学



“双涛园群童”,1910年摄于日本横滨,前排为思成(左1)、思庄(左2)、思忠(右2)、思永(右1);后排为思顺(左2)

生因学校开不了课,组织学术讲演会,免不了常去讲演),又著述之兴不可遏,已经动手执笔了(半月来已破戒,亲自动笔),还有司法储才馆和国立图书馆都正在开办,越发忙得要命。”繁重工作拖累了未痊愈的身体,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:“有时睡眠不足,小便偶然带一点黄或粉红,只须酣睡一次,就立刻恢复了。”

1926年末特别忙碌,“前两礼拜几乎天天都有讲演,每次短者一点半钟,多者继续至三点钟。”次年1月2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:“司法储才馆下礼拜便开馆,以后我真忙死了,每礼拜大概要有三天住城里。清华功课有增无减,因为清华寒假后兼行导师制,每教授担任指导学生十人,大学部学生要求受我指导者已十六人,我不好拒绝。又在燕京担任有钟点,燕京学生比清华多,他们那边师生热诚恳求我,也不好拒绝,真没有一刻空闲。”

1927年2月23日《致孩子们书》信末说:“今日我格外的忙,下午讲了两个钟头,晚上又讲了两个钟头,现在也有点疲倦了,下次再谈吧。”3月29日《致孩子们书》说:“我十天前去检查身体一次,一切甚好,血压极平均,心脏及其他都好,惟‘赤化’不灭。医生说:‘没有别的药比节劳更要紧。’”无论医生的劝告有多严厉,有多重要,都无法阻挡梁启超的工作进程:“近来功课太重,几乎没有一刻能停,若时局有异动,而天津尚能安居,倒于养生不益哩。”

至3月,肾脏手术满一年了,月底,梁启超去协和医院住院“切实检查一番”。1927年4月2日《致梁思顺书》说:“据称肾的功能已完全恢复,其他

□ 名师轶事

各部分都很好，‘赤化’虽未殄灭，于身体完全无伤，不理它便是。他们说惟一的药，只有节劳，此亦老生常谈。”没想到这位大学问家，在医学、病理学、养生学等领域，知识如此贫乏。不遵医嘱，后果自负。几天后的信中道出苦衷：“我近来旧病发得颇厉害。……本来近日未免过劳……在学校总是不能节劳的。”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清楚的，6月14日信中说：“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，这几年来，国忧家难，重重叠叠，自己身体也不如前。”

1927冬季，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，对身体伤害极大。11月14日致梁启勋函说：“日来旧恙微发，大抵因连作两文之故。（一、《〈王静安先生纪念号〉序》；二、张子武《〈墨经通解〉序》）”12月12日，再次证实医生所说过劳的危害：“我的病本来已经痊愈了，二十多天，便色与常人无异，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几篇文章，（实是万不能不做的，但不应该接连着做罢了）又渐渐有复发的形势。如此甚属讨厌，若完全叫我过‘老太爷的生活’，我岂不成了废人吗？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。”

次日，给梁思顺的信说：“我的体气底子本来极强，这点小病算什么。况且我已经绝对采用你们的劝告，把养病当一件大事了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呢？”又告诉女儿：“近来著述之兴大动，今晚本又想执笔，被王姨捣乱干涉。”看似挺矛盾的信前信后，实际不矛盾，梁启超“养病”只是说说而已，著书立说才是首要。病情无情地加重，梁启超没有预感到所剩余的时光不多，他劝在加拿大的女儿不要急着回国探亲，说：“外交部又不调动你们，

你索性等到我六十岁时才回来祝寿也不迟哩。”一贯乐观的梁启超，认为再过五年才六十岁，过六十大寿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。12月17日致梁启勋函说：“昨又小小发烧，静眠廿余小时乃愈。老态渐露，动辄有小病，殊可厌也。”月底再函：“吾数日来旧恙又剧发。”

在国外或身边的子女无不规劝父亲以养身为重，工作的事可缓就缓。梁思成事后说：“家人苦谏节劳，然以学问欲太强，不听也。”

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清楚的，1927年7月1日给梁启勋的信说：“至于病的远因，恐怕总是因为一个腰子，分泌力到底差些，所以易出毛病。”自1928年起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发病不断。

4月初，“头晕接连两日，呕吐只一次，今日已痊愈了。原因是在四五日前，精神太好，著述兴味太浓，一时忘了形，接连两晚破戒，晚上也做些工作，以致睡不着，



达（左）梁启超与梁思永（右）和梁思达（左）摄于一九二零年代

而早上又已起早惯了，因此睡眠不足，胃的消化力便弱起来（头晕全是胃的关系）。”过劳导致头晕呕吐，都是旧疾隐患、体弱多病的表现。

6月中旬，还是因过劳，“因为批阅清华学生成绩，一连赶了三天，便立刻发生影响，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。”万般无奈之下，梁启超不得不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国立图书馆的工作。

辞去国立图书馆馆长职务，还继续操劳《中国图书大辞典》的编纂，1928年8月28日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：“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，但廷灿屡次力谏我，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，常常工作过度，于养病不相宜。”此时的疾病已相当严重了，“一个不提防，却会大发，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，但经两三天之苦痛，元气总不免损伤”，所以“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，连这一点首尾，也斩钉截铁地辞掉”。

国立图书馆的职务是6月辞去的，同时，还辞去清华研究院的工作，在5月8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述说心中的极不情愿，想继续撑着。“清华研究院到底不能摆脱，我觉得日来体子已渐复元。虽不能摆脱，亦无妨，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。”

仅过了四个月，10月17日梁启超给梁思成写信，讲述自己因医治痔疮，却“上协和一个大当”：“他只管医痔，不顾及身体的全部，每天两杯泄油，足足灌了十天，（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，说是两礼拜继续吃，若吃完了，非送命不可）把胃口弄倒了。也是我自己不好，因胃口不开，想吃些异味炒饭、腊味饭，乱吃了几顿，弄得胃肠一塌糊涂，以致发烧连日不止。（前信言

感冒，误也）人是瘦到不像样子，精神也很委顿。”信中特别思念大女儿思顺：“我在病中想她，格外想得厉害，计算他们到家约在阳历七月，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。”这是《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》刊载的最后一封家书，梁启超期盼的明年北戴河的家庭团聚，最终未能实现。

二

国内军阀混战，党派争斗激烈，梁启超形容1926年局势时说：“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，但隐忧四伏，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。将来破绽的导火线，发自何方，现在尚看不出。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，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……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向混乱，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，真是不行了。”

梁启超不自觉地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。1927年5月5日《致孩子们书》说：“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于是乎我个人的出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。近一个月以来，我天天被人（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）包围，弄得我十分为难。……其中进行最猛烈者，当然是所谓‘国家主义’者那许多团体，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，次则所谓‘实业界’的人。（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）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，成一种大同盟。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，以为我肯挺身而出，便团结了，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。”

这些团体或个人，百般纠缠，耗时耗力，是在千方百计地利用梁启超的名声，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。梁的态度是：“多数人——尤其是南方的智识阶级，颇希望我负此责任，我自审亦一无把握，所以不敢

挑起担子。日来为这大问题极感苦痛，只好暂时冷静看一看再说罢。”过多的纠缠，使得梁启超身心疲惫。

梁启超实在苦不堪言，对儿女说：“我一个月以来，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，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，一提起来便头痛。因为既做政党，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，不愿做的事也要做，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。”梁启超对人对己都是认真负责的，特别是国家大事：“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，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。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。”

在纠缠、烦恼、失眠、无奈中，梁启超并没有逃避，而是寻求解决办法，终于想出了应对方法：“决定自己的立场了”，“我一个月来，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（多年来）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。自己有确信的主张，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，虽未能有很惬意贵当的，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，非打破不可。”梁启超还是以他一贯的做法——以著书立说来“救中国”，他说：“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……”

纵有众多事物纠缠梁启超，令他烦恼至极，可他还安慰子女说：“我虽然为政治问题很绞些脑髓，却是我本来的工作并没有停。每礼拜四堂讲义都讲得极得意，每次总讲两点钟以上，又要看学生们成绩……”

家事、同事，也是拖累梁启超身心健康的原因之一。

1924年9月13日，原配夫人李蕙仙病逝，梁启超悲痛万分。1926年9月26日，最小的儿子思同出生（王桂荃所生），第二年3月因肺炎夭折，给梁启超打击很大。

1927年6月，清华研究院同事，同为导师的王国维因厌恶时局，含恨自尽，梁启超说：“竟为恶社会所杀……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，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。”为这伤心事，梁启超“一个多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，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”。他本想在暑期做些政论文章，却遭到好友“蹇季常、丁在君、林宰平大大反对”。

可是在给孩子们的信中，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心情不爽：“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，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，每星期有五天讲演，其余办的事，也兴会淋漓。”梁启超有自己的信念，自己的事业：“我总是抱着‘有一天做一天’的主义，（不是“得过且过”，却是“得做且做”）所以一样的活泼、愉快。”

三

仅1926至1928年三年间，梁启超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有：1926年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《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》《先秦学术年表》《荀子评诸子语汇释》《韩非子显学篇释义》等；1927年《中国文化史》《儒家哲学》《书法指导》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等；1928年《辛稼轩先生年谱》等。

梁启超生命中的最后数月，“专以词曲自谦”，忙于撰写《辛稼轩先生年谱》，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期间，托人寻觅辛稼轩材料，“忽得《信州府志》等书数类，狂喜，携书出院”。回到天津，“未及数日，即发微热，延日医田邨氏诊治，未见有效……衰弱日甚，渐至舌强神昏，几至不起”。1928年11月27日再入北京协和医院医治，病情不见好转，又发现新病，加以身体虚弱太甚，遂卒不支，于1929年

1月19日在医院逝世。

梁启超留下许多未尽手稿，一部分是在患病期间起草的。梁思成说父亲“于人生观无论环境如何，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，虽至临终之前数日，犹日夜谋病起之后所以继续述作之计划”。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》目录中，列有《残稿存目》，达二三十篇之多，有目无文。笔者在整理编纂《梁启超全集》的过程中，努力追踪梁启超的残稿及佚诗佚文，终于看到部分残稿的“真相”。

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称：1904年“冬，著《中国之武士道》《中国国债史》两书成。所著《中国民族外竞史》改名《国史稿》，即前名之《中国通史》已成二十余万言”。在《中国之武士道·自序》中说：“顷编国史至春秋战国间，接先民警歎，深为所感。动为史裁所限，不能悉著录也。乃别著《中国之武士道》一编，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。”

梁启超自1901年起“有志于史学”，作《中国史叙论》一文，次年作《新史学》一篇，“这两篇文章便是先生著《中国通史》的准备和指导思想。他在《新史学》里面的主张，多采西学新说，加以先生的识见超卓，所以这篇文章对于整理中国旧史的工作，有很大的贡献和帮助”。至1904年，《国史稿》成二十余万言。这是梁启超早先计划编著的《中国通史》，曾改名为《中国民族外竞史》现又改为《国史稿》，并准备付印。在给蒋观云的信中说：“拙作今题曰《国史稿》，已成二十余万言，日间亦将印第一编，待丛稿就理，更当亲赍记室，乞先生一叙，乃付梓人也。”尽管这样说了，但没见《国史稿》公开发表。

在残稿中，发现的情况是这样：《国史稿》，是“残稿”中的“长篇”，用“饮冰室著述稿本”稿纸书写，共四十四页，每页正反面，每面十三行。首页署“新会梁启超述”。

笔者所见《国史稿》共四十四页，列出：

第一编：上古史。

第一卷：华族东来时代（自开辟讫洪水）：

第一章：传疑时代（神农以前）：第一节：悬谈；第二节：神话；第三节：东来最初之伟人。

第二章：初有史时代（自黄帝讫尧舜）：第一节：炎黄之际中国形势；第二节：黄帝；（第三节原稿缺）第四节：尧舜。

第三章：华族东来时代形势总论：第一节：华苗竞争大事表；第二节：地理开化之次第。

第一编后是第三编（缺第二编），与《残稿存目》同。第三编题为：发展时代。

第一章：春秋概观，与《残稿存目》所示“第三编：春秋时代至齐之霸业”不同；第二章：国土沿革；第三章：霸国政治；第四章：周室略纪；第五章：外族略纪；第六章：楚之勃兴；第七章：齐之勃兴；第八章：齐之霸业。全稿至此结束，全稿约三万余字。

此外，《残稿存目》所示《霸国政治》和《春秋时代我族与戎狄交涉表》均找到，前者共六页，后者共四页，都用“饮冰室著述稿本”稿纸，据《残稿存目》称：“亦《国史稿》之又一稿。”《国史稿》第三章“霸国政治”，残稿中又发现一份“霸国政治”，两者内容不同，究竟有无关联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1927年3月10日《致孩子们书》：“思

永说我的《中国史》，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一笔大帐，我若不把它做成，真是对国民不住，对自己不住。也许最近期间内，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，逼着埋头三两年，专做这种事业，亦未可知。我是无可无不可，随便环境怎么样，都有我的事情做，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。”1927年3月21日《致孩子们书》：“再看一两星期怎么样，若风声加紧，我便先回天津；若天津秩序不乱，我也许可以安居，便屏弃百事，专用一两年工夫，做那《中国史》，若并此不能，那时再想办法。总是随遇而安，不必事前干着急。”梁启超与梁思永谈论的《中国史》，是否就是残稿中的《国史稿》，或是其增补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《残稿存目》中有两篇年谱初稿，一是诸葛亮，一是曾国藩，特别引人关注。两者皆用“饮冰室著述稿本”纸，与《国史稿》稿纸同。《诸葛亮年谱》共四页，正反面，每面十三行。年谱起于“汉灵帝光和四年”（181），止于“后主建兴十二年”（234）。《曾文正公年谱》，共三页，起于“嘉庆十五年”（1810），止于“咸丰三年，公四十三岁”（1853），距离曾国藩卒年尚有20年，是真“残稿”。

四

梁启超身患重疾，仍然乐观向上，是坚强的信念、对国家和子女的爱支撑着他，他告诉孩子们：“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，或一天以上的生气？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，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，现在越发成熟，近于纯任自然了。我有极通达、极健强、极伟大的人生观，无



梁启超家书手迹

论处何种境遇，常常是乐观的，何况家庭环境，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。”

在1927年8月29日信中，梁启超叮嘱女儿思庄在国外学成后早日归国，“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，我将来许多著作，还要请你做顾问哩”。此时思庄正在攻读生物学，一年预科读完，升二年级，梁启超非常高兴，因为此前“你们弟兄姊妹，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，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”，“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……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”。梁启超多么期盼几年后女儿学成归国，与女儿共同探讨、研究学问。

1929年1月29日，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，享年57岁。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中，重病缠身，又备受工作、党派纠缠，但他仍以著书立说、授课演说的一贯做法救中国。三年间著述何止一二部，只是拥有的时间太短，不免留下了太多的遗憾。

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，年仅51岁，梁启超曾悲叹道：“若再延寿十年，为中国学界发明，当不可限量。”“若再延寿十年”的话语，同样适用于梁启超。丁文

江说：“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，实有四十年之历史”，“先生四十年之中，脑中固绝未忘一‘国’字。”他“文名满天下”，留下一千数百万字的论著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法律、宗教、新闻、教育、音韵等学科，甚至各类自然科学，他的论述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，影响是巨大的。

因此，梁启超的家书——《致孩子们

书》，不是一般的家书，而是充满爱国爱家情感的家书。在“家书”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爱，也可以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爱。只有祖国强大，孩子们才能更加茁壮地成长，他的著书立说，正是为了救中国。

（转自《文汇报》2017年3月31日，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
听父亲讲述他那份神秘的“地下工作”

○熊 蕾



青年熊向晖

熊向晖（1919年4月—2005年9月），原名熊汇荃，1936年9月至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，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介绍人蒋南翔、杨学诚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。1947年赴美国留学，1948年获得美国威斯特恩·里塞夫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。

建国后，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、办公厅副主任、驻英国常任代办、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、驻墨西哥大使，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、党组书记。第五、七届全国政协常委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小时候看谍战片，觉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风流倜傥，舞姿翩翩。上中学后从别人那里得知父亲熊向晖也是其中一员，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。父亲相貌自是英俊，但是他和母亲都是“舞盲”啊！终于憋不住了，我就问了父亲——那都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了，在此之前，父亲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。他们也没有机会讲，我还没上小学五年级，他们就出国工作，回来就是“文革”，然后我去“北大荒”，哥哥当兵，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。